



写作《班主任》时的刘心武

# 新话语的诞生

——重读《班主任》

□贺桂梅

1977年刊载于《人民文学》第11期的《班主任》，在当时是一篇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反响之强烈使他们（指《人民文学》编辑）吃了一惊，我也吃了一惊。”据作者刘心武自己统计，他收到的来信“现在就我过目的和我自己手里还有的算，大概有五千封左右。一开始都是正面意见，而且很激动，各阶层的人都有，全国每一个省市，除了台湾以外全有来信，连西藏都有。”（引文自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4期《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这篇如此轰动的小说不仅成为刘心武的成名之作，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新时期文学第一个文学浪潮的滥觞之作。继《班主任》之后，《伤痕》、《我该怎么办》、《代价》、《我是谁》、《蹉跎岁月》等揭露、控诉“四人帮”罪恶的小说纷纷出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悲愤而感伤的伤痕文学浪潮。可以说，刘心武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的勇敢之处在于，他的小说第一次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把矛头指向“四人帮”即所谓“外伤”和“内伤”，从而全盘否定了“四人帮”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重谈这部从“文革文学”转向“新时期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就会发现，隐于对“四人帮”控诉和指斥背后的是话语的转变，这篇小说的本质就是个人话语对畸形的集体话语的一次成功的反动，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在否定和指斥失掉合法性的旧话语的同时，慢慢取得合法的地位，并以优越者的姿态力图改造旧话语的一套策略。

“话语”（disconse）是法国学者米歇尔·富柯思

想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指出世界不仅仅是由文本的简单因素构成，而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控制整个意指的过程，“话语”和“权力”即是构成社会文化的活的因素。由此他界定“话语”不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一切从集体利益出发，以集体为主体的意指活动称为集体话语，以此相反的从人道主义出发，以个人为主体的则称为个人话语。粗略地考查中国当代文学，就会发现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一直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二元对立的平衡状被破坏，集体话语企图完全消除个人话语而成为唯一合法的权力执行者；而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即主体的回归亦即个人话语的运作；处于“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转换时期，必然存在着二者的争夺，《班主任》就是个人话语如何一步步取得合法性而集体话语的合法性如何一步步丧失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本，它以明显的隐喻方式表明了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妥协让步，不断地走向边缘化的过程。

以《班主任》发轫的伤痕文学常常被人误认为是一次知识分子的独立运动，是以人道主义正义公平的态度否定“四人帮”的非人道，但是从话语角度考虑，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罗曼谛克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是一个自造的神话。著名电影语言学家艾柯有句名言：“对意义的探索过程亦即发现二项对立的过程，事实上在哪儿发现二项对立就在哪儿掉入了意识形态之中。”个人话语以理直

气壮的正确者、先进者的姿态否定、指斥集体话语，其本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集体机器运作的必要，是一种权力的胜利，只不过由知识分子充当了发言人而已。现代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在虚构一种二元对立，并将其神圣化，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激情。现在我们以一种解构神话的方式来平静地解读《班主任》，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

《班主任》围绕是否收留小流氓宋宝琦来组建小说，以十分严密的时间顺序讲述一个班主任在某一个下午的行为及见闻。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小说开始时采用的叙述语气，那么亲密、随和，似乎读者一开始就难以拉下情面拒绝作者热情的介绍与解说甚至某种劝导。作者不断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随时引入第二人称，“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趁着他……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随后叙述角度一直停留在“张老师”的观点上，从他的所见所闻引导读者关注事态。但是有趣的是，文章中有一处却出现了一点混乱。这段描写是关于团支书谢惠敏的：“石红走后，谢惠敏激动地走出屋子，晚风吹拂着她火烫的面颊，她很痛苦，上牙把下唇咬出了很深的印子……”关于这段情景的倒叙是张老师从石红口中得知的，但是谢惠敏的举动与表情却是在石红走后发生的，那么谢惠敏的这种表现显然缺乏目击者。明显是作者不小心跳出了张老师的视角，作了一点混乱的出自想象的描绘。可见谢惠敏不仅相对于张老师和石红是个改造对象，对于作者而言，她也似乎难逃失败者的命运。尽管作者一再信任地让小说中的人物发言而且谨慎而小心地保持讲故事人的形象，仍然在无意之中流露作者早已有之的倾向性，从而使小说中话语的对抗一开始就呈现不平等的优劣态势。

分析小说文本中的个人话语和集体话语，可以发现这两者的合法性的前提是相同的，即爱国主义，争夺的焦点就在于爱国的程度，但是衡量的标准却不知不觉中更换了，不再是集体主体的意识形态的肯定，而变成“知识即是力量”——谁拥有更自由更明智的知识，谁就更有权力建设国家。集体话语中的集体主体，其合法基础是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小说文本中这一点却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小流氓宋宝琦已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引文全部引自小说原文）因此，谢惠敏所认为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已转换成了石红坚持的帮助犯了错误的人，

作为集体话语代表的谢惠敏其败势是一开始就被划分好了的。

富柯认为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通过话语而实现的权力才是切实的、有效的。“老师”是文化的传播者亦即话语的传播者，本质上是对权力的运作，因此这个职业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启蒙者的工作。小说写道：“他想到自己的职责——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是祖国的未来，就是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由此看来，小说以“班主任”命名，其喻意是很深刻的。启蒙亦即一种新话语以优越者的姿态来占领旧话语的领域，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瓦解、摧毁、剥夺旧话语的合法性。小说为此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赞歌——“从这对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扫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恐怕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再难以找到比这段描写更准确更形像更富于倾向性的对启蒙者的赞美之辞了。为了取得班主任启蒙身份的合法性，小说文本作了以下策略性的运作：对旧话语的定位与判断：“截至目前为止，在人类文明史上，能找出几个象‘四人帮’这样用最革命的逻辑与口号，掩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的例子呢”，而班主任则代表“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和美好的艺术的结晶”，因此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救救‘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也因此，他感到“他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班主任成了当之无愧的启蒙者，他的合法身份与正确性毋庸置疑。

小说中心情节似乎是如何处理失足青年，然而我们发现，真正作为启蒙对象的，并不是小流氓宋宝琦，而是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宋宝琦的被改造地位是人所共知的，而谢惠敏却是个难题。她是“没有丝毫政治投机心理”，“单纯而真诚”的班干部，她对于集体的维护较之班主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中下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呵！”但是问题就在于她维护集体的方式是“错误”的，她是个染了“四人帮”毒素的孩子。小说文本首先否决了“四人帮”的合法性：“四人帮”歪曲了领袖思想，“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

形”，而“现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领导集团”“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他感到，他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更深刻地仇恨‘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盗贼……‘四人帮’不仅糟踏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场意识形态中的权力争夺似乎变成了合法而自然的真与假、对与错、爱国与非爱国的正义斗争。由此，谢惠敏也失掉了其合法性，她的病症在于“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与盲从”，“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因此，她成了个“病孩子”——“甚至象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四人帮’用残酷的愚民政策打下的黑色烙印”。谢惠敏是文革时期强烈而僵硬的集体话语的代表者，但随“四人帮”倒台，她的话语也已丧失了尊严感和权威性，她所有的权力也随之丧失，亦即她在社会中活动的方式就被视为不正常的病态行为，必须加以改造，这也是权力运作的残酷性。当她向班主任告状说有五个团员过组织生活时打瞌睡，当她惊叫要狠批《牛虻》这本黄书，当她理直气壮地没收宣传委员石红的《青春之歌》……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已不再是权力话语的执行人，而成了新权力话语的改造对象，成为权力转换过程中的牺牲品。小说文本中的谢惠敏是唯一的一个完全孤立、屡受打击的人物，她似乎正好代表了以个人话语重新书写文化大革命的文本中集体话语代表者的命运和处境。仔细阅读小说文本，会发现班主任对谢惠敏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心态：“四人帮”揪出之前，“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四人帮’揪出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清除”，到小说最后，张老师开始反问自己：“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惠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认识真假吗？”这三个阶段似乎正好可以说明个人话语在对集体话语的转换过程中，由隐蔽地对抗，到模棱两可地共存，直至挺身而出地反击的三个隐喻性阶段。

谢惠敏的弱势事实上是由于个人话语对集体话语的拒斥与反击：“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是黄书……”个人话语的代码一个一个出现，而且都是以几乎毋庸置疑的肯定姿态的代码。而与谢惠敏相对的，个人话语的代表者则是小说文本中的另一个人物，班上的宣传委员石红，她成为新权力话语认同并加

以肯定的对象。“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盘上，使她的两颊更为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缓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段对女孩子的描写的文笔，完全凸现被描写者的个性以及描写者对这种个性特征的认同与喜爱，事实上是对女性个人主体的溢美之辞，比起对谢惠敏的描写来，差别之明显无需言说。而时刻坐在“春阳”中的石红却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写“号角诗”，在呼吁“让我们的教室响彻抓纲治国的脚步声”。与此相反的是谢惠敏却正在与班主任争论“黄书”问题，并且遭到否认。这个十分有意味的情景事实上告诉我们：石红已经成为新权力的真正代言人。整篇小说中石红与谢惠敏的每次争吵事实上都以石红取胜，并且得到了班主任的支持，原因就在于她拥有知识。“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更可欣喜的是，“这孩子常常能够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去思考、分析一些问题，这些分析和思考，往往比较正确，并体现在她积极的行动中。”文本中出现的个人话语的代码都与她有关，并由班主任来体认：“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石红早就想找《牛虻》来看”“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青春之歌》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和“带褶子的短裙”是个人话语的重要代码，其作用正如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参与者们总穿起“白边懒汉鞋”与“花衬衫”一样。服装是为了适应话语的需要，成为话语中鲜明的代码，“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和“带褶子的短裙”表明了石红的性别色彩，其丰富而自觉的私生活空间正是个人话语认同的主导方面。正因为如此，作为个人话语的启蒙者的班主任才会指责谢惠敏：“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而《牛虻》和《青春之歌》作为个人话语的一种文本范本，也只有石红这种有“思考能力”的女孩子才如此热衷，而无论是失足青年的小流氓宋宝琦还是变相失足的团支书谢惠敏，都受到“四人帮”执行的集体话语的毒害，一致认定这些书是“黄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谢惠敏那样品行端方的女孩子，同宋宝琦这样品质低劣的坏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该有多大啊，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这一点上，却又不谋而合——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作出这个结论的。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谁造成的？谁？/当然是‘四

人帮’！/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四人帮’铭心刻骨的仇恨，象火山一般喷烧在张老师心中”。这段文字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今天重读起来，似乎让人感觉情绪之激烈到了某种不自然的夸张的地步。这是一种话语被另一种话语拒斥后的紧张而焦虑的感情。张老师因为宋宝琦、谢惠敏拒绝阅读《牛虻》并且对它作出“不公正”的判断而感到对“四人帮”的火山喷烧般的愤怒，但他是否考虑过，他是否曾经认真地看过“批宋江”的报纸？而谢惠敏对于不听报纸而打瞌睡的团员的愤怒是不是也不亚于他此刻的情绪？

小说最后一个关于石红的场面是：“迎门的那间屋里，坐满了人。石红坐在屋中饭桌边，正朗读着一本书，另外有五个女孩子，也都是张老师班上的学生，散坐在屋中不同的部位，有的右手托腮、睁大双眼出神地望着石红，有的……显然，她们都正听得入神。”通过这个场面，我们可以看出石红已经完全取代谢惠敏，坐到了发言者，坐到了引导人群的地位，成为新话语权力的合法执行者。“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路线对了头，只要老师、同学们发挥集体的作用，小流氓也能转变的啊！”——路线的执行者，阶级关系的成功的斗争者，这些优越的身份都归到了石红身上。当谢惠敏念批宋江的报纸时五个团员打瞌睡，而当石红念个人话语的小说时五个女孩子却听得如此入神，两相交锋，优胜劣汰，结局已非常明显：只有个人话语才能真正吸引群众，引导群众，只有成为个人话语者才能真正掌握权力。

小说写到此处，新话语改造旧话语已经理顺气畅。面对五个点头称是、心悦诚服的女学生，张老师当然自信心倍增，有勇气理直气壮地去启蒙谢惠敏。这时他已不再感到退缩、犹豫，“用不着思索，蹬上自

行车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向谢惠敏家里驰去”“他疼爱谢惠敏，如同医生疼爱一个不幸患上传染病的健壮孩子……那些‘四人帮’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是一定能够杀灭的。”“快到谢惠敏家的门口时，一个计划已在张老师心中初现轮廓：他今天要把书包中的那本《牛虻》留给谢惠敏，说服她去读读这本书……”——一位团支书变成了病孩子，一本“黄书”变成了启蒙的教材，这两者的转变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话语的置换。小说全文的演绎任务差不多已全部完成，虽然最后的结局还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但是“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鼓励与肯定……”，没有人会不相信这个承诺的实现事实上已近在眼前。

对《班主任》的解读至此也应该结束了。考虑整个新时期文学以《班主任》为起点，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乃至新写实小说，都是在延续一种话语的转折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话语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然，而集体话语似乎越来越趋于边缘化，仅仅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隐晦地存在新时期许多小说之中。然而无论是争夺或是退却，这两种话语的存在却始终互为前提。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谢惠敏这种集体话语的存在者，张老师慷慨激昂的激情和愤怒也无从说起，而石红的“带碎花的短袖衬衫”亦不足为奇。正如前文中引用过的艾柯所说：“在哪儿发现二元对立，就在哪儿掉入意识形态之中”，所谓的话语争夺也不过是意识形态机器运作的表现而已，我们从中获取的也许仅仅是一些了然于心后的平静心灵。

★

